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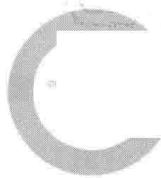


金朝“异代”文士的 民族认同之路

Jin Dynasty's Literates from Other Nations On the Road
of Ethnic Identity

李秀莲 著

中華書局



金朝“异代”文士的 民族认同之路

Jin Dynasty's Literates from Other Nations
On the Road of Ethnic Identity

李秀莲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朝“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李秀莲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7.1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101-11188-0

I. 金… II. 李… III. 中国历史-研究-金代 IV. K246.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01584 号

书 名 金朝“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
著 者 李秀莲
丛 书 名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责任编辑 吴爱兰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7^{3/4} 插页 2 字数 280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1188-0
定 价 59.00 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大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绪 论	1
一、命题的提出	2
二、几个关键词的阐释	4
三、研究现状	14
四、命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主要观点、研究方法、学术创新	23
第一章 女真人的“族群认同”与阿骨打“变家为国”	27
第一节 女真人的“族群”认同	28
一、女真人的来历	28
二、女真人的区分与族群认同	30
三、熟女真的分布	34
第二节 女真完颜部核心地位的确立与贵族政治的形成	45
一、女真完颜部走上独立发展之路	45
二、反抗辽朝，女真完颜部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	48
三、阿骨打的“父权”与家族政治	50
第三节 从都勃极烈到皇权政治的转变	52
一、学术界关于“都勃极烈”问题的争议	53
二、“国相”与都勃极烈	58
三、女真人认同的都勃极烈	67
小 结	70
第二章 渤海人与女真人的互相认同	72
第一节 女真、渤海本同一家	72
一、渤海政权的性质及其与女真完颜部的关系	73
二、渤海遗民与女真人的共同政治目标——反辽	74

三、女真与渤海人的政治联姻	79
第二节 渤海文士杨朴劝阿骨打称帝	82
一、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研究与论争	82
二、捭阖诸说,寻找劝阿骨打称帝的人	84
三、杨朴劝阿骨打称帝的时间	87
四、杨朴劝阿骨打称帝对金朝开国的贡献	89
第三节 杨朴在《金史》中的隐遁与金初政治认同的错综复杂	91
一、杨朴在《金史》中的隐遁与贵族政治危机	91
二、杨朴“献策”与女真人的认同	95
三、杨朴在《金史》中的隐遁与其“献策”的局限性	98
第四节 高庆裔对女真贵族政治的认同与颠覆	100
一、高庆裔的通事身份与其发迹	101
二、高庆裔参与对宋交涉	104
三、高庆裔与宗翰的贵族政治	107
四、高庆裔在贵族政治与皇权之间沉浮	113
小 结	117
 第三章 燕云文士对金朝政治的认同	119
第一节 燕云文士政治认同的同一性	119
一、燕云文士多主动归降	119
二、张觉叛金归宋,燕云文士民族认同的拷问	121
三、燕云文士以保境安民为己任	121
四、燕云文士推动女真贵族转变观念	123
第二节 韩企先“隐于朝”	126
一、韩企先为宗翰的“门人客卿”	126
二、韩企先入朝立“难言”之功	128
三、韩企先“世称贤相”	133
第三节 韩昉为帝王之师	136
一、韩昉入仕“内朝”	137
二、韩昉在熙宗背后	142
三、韩昉一而再地求退	147

小 结	152	
 第四章 两宋仕金文士群体的复杂与其民族认同道路的分歧		154
第一节 宋朝文士仕金态度的分殊与嬗变	154	
一、宋朝文士通过多种途径入仕金朝	155	
二、宋朝文士对金朝政治从抵触到适应	156	
三、宋朝文士个体的态度与政治大环境	159	
第二节 宇文虚中从“南冠客”到“国师”	163	
一、宇文虚中四使金营	164	
二、“南冠客”滞留金营的复杂情感	166	
三、宇文虚中在金营“露才现奇”	173	
四、宇文虚中入朝为“国师”	180	
第三节 文化认同的错位与宇文虚中之死	183	
一、宇文虚中“疑案”的起因	183	
二、汉文化与女真习俗的冲突	186	
三、宇文虚中与女真贵族间的文化认同取向	191	
小 结	194	
 第五章 “异代”文士家族势力的兴衰与民族认同之路的延伸		196
第一节 “名士”与“庶士”家族的兴衰	196	
一、“名士”家族民族认同之路的分殊	196	
二、“名士”家族对金朝的认同与被认同	201	
三、“庶士”家族地位的上升	207	
四、“庶士”家族裙带关系的恶性发展	209	
第二节 渤海张氏家族的民族认同之路	214	
一、张氏家族的荣显与君王的眷顾	215	
二、张浩“无事不为，无役不从”	219	
三、张浩与海陵“霸王”政治	220	
四、天下“大定”与张氏家族	226	
五、大定朝的“无为”政治	228	
第三节 张氏兄弟“以言辅政”，踯躅于民族认同之路上	233	

一、应对世宗“求谏”“求贤”	234
二、张氏兄弟“临事多徇”	238
三、张氏兄弟与魏徵的“差距”	240
四、张氏兄弟的忠臣逆境	245
小 结	249
 结论：“异代”文士民族认同的歧义与歧途	251
一、“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与女真人的“汉化”	251
二、“异代”文士民族认同的“合力”	252
三、“异代”文士民族认同的歧途	254
 参考文献	266

绪 论

金朝是女真人建立的政权，灭辽荡宋，入主中原，被视为北族王朝之一。百余年间，从氏族部落跃进到国家，走过了中原王朝从商周到秦汉三千多年的历程。有学者关注这一社会现象，并概括说，“金元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政治制度有一个从原始状态、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发展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前代制度发展过程的浓缩”^①。“发展过程的浓缩”意味着历史的大跃进。

在这个从低级向高级社会大跨越的历史进程中，女真人曾面临发展道路的多向选择问题。摆在女真人面前的道路有三条：一是女真人走自己的道路，充分发展由氏族部落向国家转化的道路；二是仿效辽朝的南、北面官制，实行汉地、王权、部族三重统治；三是全盘吸收汉文化，走汉化、建立皇权专制的道路。历史多重因素的际遇，女真人最终选择了接受汉文化、认同汉文化的道路，女真人接受汉文化的具体过程与金初“借才异代”的关系密切，也就是说，“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伴随着女真人接受汉文化的过程。

金朝“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表现的是辽宋“异代”文士群体与女真社会互为认同的过程。以武力征服而建国的女真人占据辽地，进入宋境。武力征服仅能维持短期的占有，长期的统治则需要文治。以骑射见长的女真人穷蹙于文治，必须选择“借才异代”来实现统治。“异代”文士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女真人统治的金朝，情愿与不情愿的民族认同便不可避免地发生在“异代”文士与其所面对的女真人和女真政权上。“异代”文士与女真人的民族认同是双向的运动，认同与被认同、接受认同与拒绝认同同时进行，所以说，民族认同之路，不是单一的认同，不是接受汉文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异代”文士是中原文化与女真文化沟通的主要桥梁，正是由于他们多方面的推动，加之历史的际遇，女真统治者才有可能

^① 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绪论》第5页。

入主中原,走上皇权专制的道路。

“异代”文士作为金初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社会群体,对女真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尤其在参与皇权、皇权政治的构建,以及皇权的进一步发展、变异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异代”文士在推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为历史所创造,即“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异代”文士与女真人共同经历了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乃至民族认同,通过“异代”文士铺设的民族认同之路,女真人(部分)与汉人逐渐融合。

一、命题的提出

金朝是以女真人为统治者的多民族、多族群的联合政权,其发展的主线是民族认同、民族文化认同的过程。民族认同,在当时的历史境况下,首先表现的是族群的认同,即女真人与包括汉人在内的族群认同,“异代”文士群体进入女真社会是服从政治需要的民族认同。其次是文化认同,女真人确立政权,需要在制度层面上认同汉文化,这一认同的实现主要通过金初进入女真社会的辽宋文士,即向“异代”文士“借才”。金朝“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主要有两个向度:一方面是他们对女真社会的认同,包括从拒绝到认同,或者“曲线”认同,以及女真人对“异代”文士的认同行为的回应;另一方面是女真社会认同“异代”文士及文士群体的不同回应。两个向度的认同始于文化认同,运行于政治认同的过程中,终结于民族认同。

“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是通过引导女真贵族接受、礼遇汉文化,以塑造皇权、皇权政治为目标。女真社会皇权政治的塑造是“异代”文士文化认同的符号、政治认同的媒介、民族认同的象征。金朝皇权政治的出现缘于“异代”文士的介入,来自辽宋的“异代”文士把汉文化移植到女真社会,女真人接受了汉文化,把女真人的“尊号”“大号”都勃极烈改成“皇帝”。在以诸勃极烈联合的贵族政治为核心的女真社会嵌入“皇权”,并推动皇权政治从不同的方向削弱贵族政治,动摇了女真贵族对“旧俗”的坚守。在“旧俗”变革的过程中,女真人接受汉文化或是有意识的,或是无意识的。但当发现汉文化要改变女真“旧俗”时,部分女真人表现出有意识地排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3页。

拒绝汉文化,连带排斥汉文化的载体——“异代”文士,这样,“异代”文士又成了民族文化认同过程中,遭遇文化冲突的罹难者。“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道路与女真人对汉文化的认同影形相随,同样曲折。

女真贵族政治中滋生皇权,发展皇权政治,使之具备了入主中原、统治半壁河山的资本。皇权政治缘于至上皇权的出现,皇权制造了围绕它运转的国家机器,皇权对国家机器具有绝对的控制权,不论是真皇权还是假皇权(真皇权是指皇帝拥有权力,假皇权是指他人假皇帝之名拥有权力),皇权就是独占,对国家机器的全部“独占”,官僚、军队、监狱等全部在皇权的驾驭之下。

“异代”文士推动女真贵族认同汉文化,催生了女真社会的皇权、皇权政治的出现与发展。皇权出现后,“异代”文士与女真贵族之间民族认同道路的取向又处于皇权控扼之中,作为女真人认同汉文化的桥梁,既在皇权之内,又在皇权之外。在皇权之内,文士是皇权政治的组成部分,就这一点来说,与中原王朝的士人一样,正如汉高祖刘邦所说:“贤士大夫有肯从吾游者,吾能尊显之。”^①唐太宗也曾有言:“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②“贤士”“英雄”始终是中原帝王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帝王主动招徕文士辅佐皇权,首先是利用,同时也是安抚、束缚。金朝“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有这样的经历与内容,这是金代皇权与中原皇权的同一性所致;金代皇权又不同于中原王朝的皇权,金代皇权还有排斥“异代”文士的一面,在皇权之外,“异代”文士不同于与刘邦“同游”的“贤士”,更有别于唐太宗“彀中”的“英雄”。首先,“异代”文士或来自辽,或来自宋,其文化背景与女真人不同,他们带着异质文化进入女真社会,冲击、变革女真社会,必然造成自身与社会的冲突与困境;其次,“异代”文士的文化素养与女真人存在一定差距,差距的缩小一方面表现为“异代”文士极力同化女真人,另一方面是女真人也有异化文士的企图。民族认同道路上,认同与拒绝认同不以任何一方的意志为转移,“夷夏”互变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

来自渤海族群、辽朝燕云地域以及宋朝的“异代”文士从不同的出发点,或自愿、或被迫进入女真社会。他们推动女真人认同、接受汉文化,并

① [汉]班固:《汉书》卷1《高帝纪》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71页。

②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15《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59页。

在女真社会培植了皇权、皇权政治。女真社会出现至尊的皇权，打破了氏族社会遗留的所谓“平等”“民主”之旧俗壁垒。带着女真旧俗痕迹的皇权虽然背离了女真贵族民族自树的意愿，但也没有达到“异代”文士改变女真人、女真社会的政治期许。发生在这里的民族认同是不以认同者与被认同者任何一方的意志为转移的。金朝“异代”文士在确立皇权、发展皇权政治的期望与失望中徘徊、踌躇；金朝女真贵族控制的皇权政治既接受汉文化，又排斥汉文化，给“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带来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异代”文士是两种文化相碰撞的授受者、推动民族文化互相影响的践行者、文化交流的媒介。“异代”文士推动皇权、皇权政治在女真社会出现，皇权政治虽然确立在对贵族政治否定的基础之上，但是，女真人的“本我”民族认同先于、高于政治认同，或者说女真人的“本我”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互为表里。金朝政权中，女真贵族处于最高统治阶层，所建立的政权的民族性是不可改变的，带有民族色彩的皇权既打击贵族又依赖贵族，斗争的最终结果是皇权与女真贵族媾和。在两者的争斗、媾和中，“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险象环生，艰难曲折。

金朝的发展时刻面临着民族认同道路的抉择，民族认同道路的抉择捭阖在“异代”文士、女真贵族、皇权之间，归根结底是确立皇权政治。“异代”文士斡旋在皇权与贵族之间，为了使女真人认同汉文化，作为桥梁的“异代”文士必须先接受女真人及其文化，理解女真人的生活方式等。“异代”文士民族认同之路上的认同与被认同的互动关系中潜藏着巨大的研究张力和书写张力，包含着民族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金朝社会发展取向的抉择以及兴替等问题。所以，“金朝‘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是揭示金朝历史及其特殊性比较重要的学术研究切入点。

二、几个关键词的阐释

研究金朝“异代”文士民族认同之路，既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承，也寓意着笔者不断深入探索的努力。围绕这一命题需要阐释几个关键词。

(一) 金朝——北族王朝

研究金朝“异代”文士民族认同之路，揭示的是金朝的特殊性。就金朝的特殊性而言，研究者的认识与定位殊异，有美国学者把金朝纳入“征服王朝”体系中，有日本学者提出“北亚历史世界”的概念，中国大陆学者多认同

“北族王朝”的界定。学术争论有益于学术发展,但争论是有原则和标准的,不论是概念还是理论,都要忠实于历史的客观性。金朝是以北方族群女真人为统治主体的政权,它的建立、发展直至灭亡不能忽略它的民族性。对其民族性的深入认识是有助于研究“征服王朝”论、“北亚历史世界”论和“北族王朝”论歧义的结点所在。

1.“征服王朝”论

美国学者魏特夫在研究“作为中国社会史一部分的辽朝”^①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其历史的特殊性,指出辽朝具有征服王朝的模式,“被直接或间接地当作后来在中亚以及在中国本部的征服的一个模式”^②。与其后的金、元、清同为征服王朝。其中,“辽金两个王朝代表征服模式的两个主要亚型,即在文化上抵制的亚型(辽)和在文化上让步的亚型(金)”^③。

魏特夫把金朝作为征服王朝模式的一个亚型看待,既指出它们具有“征服王朝”的共性,又揭示出辽金两者各自的特殊性。诸如“涵化”与第三文化,征服王朝的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相接触,其文化不是简单地同化、融化和传播,而是复杂的涵化。“涵化过程并非机械的积累。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双方,在接触后都有所改变,从而在相互调整中产生出第三文化”^④。在复杂的接触过程中产生的第三文化保留了接触者文化中某些原来的成分,而另一些成分则以新的面貌出现或完全消失。契丹、女真与“他者”接触,主要是汉文化接触过程中确实出现了“第三文化”,契丹、女真的“第三文化”最明显的表征莫过于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契丹、女真文字对契丹人、女真人是新鲜的,对汉人也是陌生的,这就是典型的“第三文化”,但不能否认“第三文化”与相碰撞的第一、第二文化的源泉关系。魏特夫提出“征服王朝”论意在驳斥“汉化”论者以结果代替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偏颇,强调相接触的族群存在“汉化”的过程,是有价值的论断。诚如他自

^① [美]魏特夫:《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总论》,载王承礼主编《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第1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6页。

^② [美]魏特夫:《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总论》,载王承礼主编《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第1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4页。

^③ [美]魏特夫:《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总论》,载王承礼主编《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第1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44页。

^④ [美]魏特夫:《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总论》,载王承礼主编《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第1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34页。

己所言：“与赞成所谓汉人总是融化他们的征服者的论点相反，似乎应该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①

“征服王朝”论的出发点是把辽、金、元、清作为中国社会史的一部分，研究其特殊性。与“南北对立”立场上的“征服王朝”论不同^②，魏特夫“征服(和渗入)王朝”论的提出是相对“典型中国王朝”而言，如秦汉、隋唐，对比中强调辽、金、元、清的特殊性。这种认识有一定的客观性，其不足是以局部的特征概述全部，征服王朝的“征服”是部族政权向国家政权转化过程中的一种方式，仅仅是政权建立过程中的特殊性，而不是整个王朝历史过程的特殊性。辽、金、元、清政权的建立者以其所擅长的骑射不断征服周边邻部，建立部族大联盟酋邦政权，酋邦政权在短时间内转化成国家政权是通过征服中原，占据、享用中原的文化、文明成果实现的。迨他们入主中原(辽朝仅有局部除外)后，武力征服者的优势地位逐渐消失，处于被中原文化化的征服之中。面对被中原文化征服的趋势，女真统治者采取种种举措防止、扼制被汉文化征服。在这个金朝拒绝被中原文化征服的历史过程中，“异代”文士不得不服从金朝的政治形势和环境，他们既是政治认同的被征服者，又是文化认同的征服者。

2.“北亚历史世界”论

由于“征服王朝”论强调辽、金、元、清的特殊性，又把局部的特征与表象概述为王朝全部的特征，即所谓“征服王朝”。“征服王朝”论引来学术界的两种误解，一则认为“征服王朝”论有分裂中国历史的企图，代表者有张博泉和景爱等学者^③。另一则认为“征服王朝”论远没有达到分裂中国历

^① [美]魏特夫：《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总论》，载王承礼主编《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第1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24页。

^② [日]爱宕松男：《契丹古代史研究》，邢复礼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页。引论中说：“当十世纪之初，契丹族的英雄耶律阿保机即首先与同族的奚族建立部落联合，并以此为基础，征服了满蒙一带的邻近诸族，接着，乘胜南越长城，吞食了中国北部，缔造了占据中原的北方民族国家，即所谓征服王朝的辽国。”

^③ 张博泉：《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5页，据载：“‘征服王朝论’旨在分裂我们伟大祖国的民族和国家。”景爱：《“征服王朝论”的产生与传播》，载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4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367—368页，作者指出：“日本学者提出的‘骑马征服王朝’与魏特夫的‘征服王朝’在某些方面不尽相同，日本的‘骑马民族征服’论者之间，意见也并非全部一致，但是他们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却是相同的：都是将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对立起来，竭力夸大差别和对立，缩小、抹煞汉族与游牧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密切联系，从而歪曲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达到分裂中华民族的目的。”

史的目的,日本学者田村实造尤其不赞同“征服王朝”论。他说:“如像以上这样给中国征服王朝下定义,则不加任何定语,原封不动将征服王朝四个字加在前面所说的五胡十六国和北朝各政权的头上,恐怕是不妥的。”^①进而提出“北亚历史世界”的概念。所谓“北亚历史世界”论,“即是在亚细亚方面,由地形划分出来以东亚细亚、北亚细亚、南亚细亚、西亚细亚四大地域,从先史以来即形成了以此为范畴的文化区域,即是说以此为基础的四大历史世界各自作为个别的特殊的世界,一直并存到近代。……在北亚细亚和东亚细亚从先史时代以来即形成了性质各不相同的文化区域;然后以此文化区域为基础,形成一个历史世界,直至二十世纪;因此,北亚细亚史必须看做和东亚细亚史具有独立性的历史发展的世界”^②。

田村实造的“北亚历史世界”论利用魏特夫“征服王朝”论中以辽、金、元、清的局部特征概述为全部特征的不足,演绎出中国历史上的中原与北方对立的论说。他说:“对这一系列征服王朝是仍按历来的看法把它们视为中国史的一环,还是该把它们视为中国史以外的自成一个历史世界的北亚史的一环,并站在把中国史和北亚史都包括进去的更高的立场去考察,这对于东洋史学家来说,是一个重要而又饶有兴趣的课题。我想站在后一立场,即把中国史和北亚史合起来的立场来考察中国征服王朝,但作为研究的前提,必须先从考察征服王朝所由兴起的北亚世界开始。”^③

“北亚历史世界”论完全出于研究者的“立场”,是研究者主观地“操切”“打扮”历史的结果。为了适应研究者的“立场”需要,有意否定树木与森林的关系,只提树木,不言森林。“北亚”作为地理概念是存在的,但“北亚历史世界”是人群活动的世界,人的活动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北亚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是人为地割裂出来的历史。秦汉长城就是要人为地划分出南自南、北自北,但历代统治者企图人为地割裂长城内外,恰好说明长城内外联系的存在,而且是割不断的。历代统治者企图用长城割裂南北

① [日]田村实造:《关于中国征服王朝》,载王承礼主编《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第1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99页。

② [日]田村实造:《北亚细亚历史世界的形成》,傅仲涛译,《绪言》第1—3页,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67—368页。

③ [日]田村实造:《关于中国征服王朝》,载王承礼主编《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第1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98页。

是徒劳的,日本学者人为地划分“北亚历史世界”也是枉然。自古以来,北亚发生的历史始终与中原王朝的历史休戚相关,是中原王朝历史的一部分,是有自己特殊性的、能补充中国大历史的一部分。北亚历史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与中原王朝的依存、互补关系的存在。

3.“北族王朝”论

较早使用“北族王朝”一词的是日本学者爱宕松男^①,他用“北族”作为“异族”的代名词。美国学者芮乐伟·韩森著《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②一书,视北族王朝为异族统治,同样赋予“北族”为“异族”的内涵。中国大陆学者也使用“北族王朝”这一概念,所不同的是从客观的中国历史情况出发,赋予它更广泛的含义。首先,张帆用“北族王朝”简称各北方民族所建立的王朝^③。其次,申友良在《中国北族王朝初探》一书中提出:“北魏及其以后由北方游牧民族通过武力征服与在征服过程中的文化吸收而建立的王朝称为‘北族王朝’,其实质上就是‘中原王朝’的一个亚型。因此,北族王朝只包括北魏、辽、金、元、清这些朝代。”^④再次,姚大力指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从来就不仅仅是汉族的历史和文化,而是汉族和其他许多少数民族的共同遗产。在历史上,汉族的中央王朝经常把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为什么到中原建立王朝的少数民族就要被视为‘外族’甚至‘异族’?元人自己把当国的蒙古人称为‘国人’;在需要强调族属之别的时候则名之曰‘国族’,或者‘北族’。使用‘北族’王朝来指称辽、金、元、清等等历史上的非汉族政权,与以‘外族’‘异族’来对它们进行界定相比,显然要有更多的历史包容性。”^⑤

就“北族”所指的不确定性,中国大陆学者对“北族”的界定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驳斥“异族”的问题。“北族”被视为“异族”的前提是北族被人为

^① [日]爱宕松男:《辽金宋三史的编纂与北族王朝的立场》,《文化》十五卷4号,日本:东北大学,昭和廿六年(1951)。

^② [美]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 Sen):《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梁侃、邹劲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80页。

^③ 张帆:《元朝的特性——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赵汀阳、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1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57页。

^④ 申友良:《中国北族王朝初探》,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前言》第4页。

^⑤ 姚大力:《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启示录:漠北来去》,长春出版社,1997年,第26—27页。

地理解成北方民族的简称，中国大陆学者也有这样的认识^①。如果北方民族作为一个与中原汉族一样的民族实体而存在，就必然与中原汉族并存且对立，相对汉族来说是不同的民族，被称为“异族”也是成立的。北族是否是“异族”，关键要论证所谓“北族”是否是一个与汉族一样的民族实体。

“北族”首先是方位问题。北，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在中原王朝以北的地域范围内，一是指在中原王朝统治范围内的北部。既然以中原王朝为参照，所谓中原王朝本身也是变化的，商周时期的中原王朝与隋唐时期的中原王朝所统治的范围是不同的，商周以降，汉民族的核心尚在形成中，商族（族群）、周族（族群）与其北部的鬼方等族群是一样的，有时是并存关系，有时是联盟关系，至秦汉，汉民族的核心基本形成，大汉与强胡（匈奴大联盟）的对峙，一方面促进了汉民族的凝聚，另一方面暴露出匈奴大联盟的松散与虚无，在秦汉政权的打击下，匈奴大联盟内部矛盾加剧，大联盟的解体宣告“北族”蜕变成民族实体的失败。此后，北族冠名下的任何族群，包括高车、柔然、铁勒、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都不具备自然地发展成与汉民族一样的民族实体的客观条件，无法具备与汉民族相比的成熟性。汉民族是一个相对恒定的民族实体，不论政权存在与否，民族实体都能独立存在，而北族则不然。北族也有短暂的民族体（民族形成初期）存在，但必须与政权唇齿依存，互为表里。政权灭亡，民族体也随之消亡，如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鲜卑人、建立辽朝的契丹人、建立金朝的女真人、建立元朝的蒙古人、建立清朝的满洲人多随着政权灭亡而消逝，融入汉人中。建立元朝的蒙古和建立清朝的满洲情况虽有些特殊，但参与元朝统治的蒙古人多数在元朝灭亡后融入汉民族。今天的蒙古族的先民多不是元朝居统治阶层的蒙古人的后裔，今蒙古族多是来自元代蒙古的边缘族群，他们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崇拜成吉思汗的情感认同，转化为民族认同。满洲民族也一样，他们的存在主要是今天的民族政策保护的结果，是政治化的民族，与参与建立王朝的蒙古、满洲不同，不能以今天的蒙古民族、满洲民族比附元朝的蒙古人和清朝的满洲人。

女真、蒙古、满洲等所构成的“北族”不是民族，在进入中原前，他们是

^① 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前言》第1页，“北族”即所谓北方民族，主要是阿尔泰语系诸民族（Altaic peoples）。